

#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前驱

## ——以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为中心

于阿丽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51)

**摘要:** 顾毓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 他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中提出, 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 从表面上看似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冲突, 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把之作为“文艺复兴”的前驱, 看到二者前后承继、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顾毓琇的这一观点既不同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直接把“五四”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 也不同于李长之强调“中国文艺复兴”与“五四”之间存在着断裂转向的看法, 而为当今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

**关键词:** 顾毓琇; 《中国的文艺复兴》; 文学革命; 文艺复兴; “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8)02-0032-05

顾毓琇(1902-2002)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 还被誉为“文理兼通的一代宗师”“一代文理大师”。<sup>[1]</sup>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他曾怀着满腔的热情, 写下了多篇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文章, 并结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一书出版。此书是当时对“中国文艺复兴”话题展开较为全面论述的重要著作之一, 《顾毓琇全集·前言》曾明确指出: (此书)“正是战后‘复员’声中讨论中华民族复兴问题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著。”<sup>[2]</sup> 然而, 由于顾毓琇长期定居国外, 又加上他有着显赫的科学家身份, 诸多原因使《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迄今尚未引起学界关注。

对于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 可以从多方面展开深入的解读。本文所重点谈论的是, 顾毓琇在此书中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思考, 并结合20世纪30-40年代的相关著作(如胡适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李长之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 对顾毓琇的这一观点展开进一步的剖析。希望能够借此抛砖引玉, 引起学界人士对此书关注, 也期待对于当今社会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讨论热

潮能够有所启发。

—

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之间关系的思考, 顾毓琇主要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的上卷“文学革命与文艺复兴”话题中展开论述的。在此书一开篇, 顾毓琇首先解释了自己对于“中国文艺复兴”的理解。他不仅强调了这一运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还把之看作是“民族复兴”运动中的重要环节, 而非一个孤立的存在。他写道:

中国的文艺复兴, 是目前迫切需要一个运动。我以为民族复兴运动包括三大要素: 政治革命、社会改造和文艺复兴。这三个运动同样重要, 缺一不可。<sup>[3]</sup>

紧接着, 他运用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他指出, 欧洲的民族复兴运动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经由“宗教改革”最终完成了“政治革命”; 而中国的道路则与欧洲几乎完全不同, 自从孙中山倡导革命以来, 中国首先展开的是“政治革命”, 然后借助“文艺复兴”的途径, 试图达到最后的“社会改造”。尽管当时在有些

收稿日期: 2016-10-26

作者简介: 于阿丽(1980-), 女, 山西晋城人, 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文学理论。E-mail: yuali1980@126.com

人看来，“社会改造”成绩最差，应当迎头赶上。然而，顾毓琇却认为，“文艺复兴”仍未成功，仍需要继续努力。

正因为如此，顾毓琇便自然地引出了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在他看来，此书的书名本身便意味着“中国文艺复兴”的尚未完成，还有待大家的进一步努力。与此同时，顾毓琇还列举出当时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种种说法，其分歧之处主要在于，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比如：是否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着“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否认可“五四”新文化运动意味着“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起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否已经取得了成功？针对上述问题，当时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此基础上，顾毓琇进而直接引用了李长之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的大段文字，具体介绍李长之把“五四运动”评价为“启蒙运动”、而非“文艺复兴”运动的观点。

随后，顾毓琇把笔锋一转，开始关注胡适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诸多论述。可以说，正是建立在对于胡适观点的某种继承与反思的基础之上，顾毓琇才真正完成了自己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之间关系的思考。

顾毓琇使用了较多的篇幅，依次对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的革命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尝试集》《白话文学史》，及《宗教与哲学》《文学革命》等英文文章展开了相关分析。他首先提及的是胡适的《宗教与哲学》和《文学革命》，正是在这两篇英文的文章中，胡适曾把宋儒的建立新孔学、以及民国时期的“文学革命”先后称为“文艺复兴”。随后，对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倡的文学上的“历史进化”说或“后来居上”说，他坦诚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某种怀疑，但同时也提醒人们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特殊语境，并紧接着谈论了胡适在《建设的文学的革命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等文中对自己这一主张的调整和修正。

最后，顾毓琇高度赞赏了胡适等人所领导的“文学革命”，在促使“中国文学永远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上面的贡献，并进一步明确声称“有意的尝试创作是光明的新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顾毓琇开始正式阐述自己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之间关系的思考：

文学革命是文艺复兴的前驱，乃是毫无疑问的。为着讨论的方便，我们应当分别“文学革命”与“文艺复兴”。以时间论，文学革命在前，文艺复兴在后，没有文学革命，便不易有文艺复兴。以内容论，文学是艺术的部分，文艺包括文学与艺术。革命是复兴的前驱；革命的工作，破坏重于建设；复兴的工作，建设重于破坏。破坏以后便于建设，革命以后必须复兴。我们可以引申文学革命的理论到文艺创造的理论：我们必须建立“活文艺”和“真文艺”。<sup>[3]P128</sup>

顾毓琇在此明确地提出，“文学革命”是“文艺复兴”的前驱。这里的所说的“文学革命”，其实具体所指的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借此表明了自己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之间关系的认识。在顾毓琇看来，“文学革命”与“文艺复兴”是两个必须加以区分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也不仅仅是内容上的从属问题，更重要的地方在于，二者之间有一种逻辑上的前后承继的关系，有一种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

不仅如此，顾毓琇还进一步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文学革命”与“文艺复兴”有着各自不同的重点。前者更侧重于“破坏”，而后者更侧重于“建设”。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冷静地指出，这两个阶段虽然重点不同，却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因此，他对双方并没有流露出丝毫厚此薄彼的态度，没有采用一褒一贬的言辞，而是都予以了充分的理解与足够的重视，所谓“破坏以后便于建设，革命以后必须复兴”。正是这样，在顾毓琇看来，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创造”之间，可以通过“引申”和发展来加以实现，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这也是他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之间关系的独特理解。

## 二

顾毓琇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之间关系的理解，具有着重要的意义。要想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需要回顾晚清自民国

以来有关“中国文艺复兴”话题的讨论情况,并具体比较顾毓琇与当时一些学者在看法上的联系与差异。

根据相关的研究可知,其实从晚清至民初,梁启超、将方震、邓实等众多学者就开始广泛提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并纷纷使用“古学复兴”“文学复兴”等术语来指称“清代的学术”。<sup>[4]</sup>最早使用“中国文艺复兴”来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美国的王克私教授在 *Some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1922) 一文中提出的。这篇文章的写作曾得到了胡适的帮助,但胡适似乎对此文并不满意,很快便自己写作了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1923) 一文,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从宋代开始算起,明代的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清代的学术是第三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第四期<sup>[5]</sup>。伴随着胡适1926年在欧美有关这一话题的系列演讲,他曾一度被欧美学界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sup>[6]</sup>

随后,胡适又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文艺复兴》(1934),还于1935年在香港大学进行了“中国文艺复兴”的演讲。与此同时,蔡元培等人也表达了与胡适相类似的看法。<sup>[7]</sup>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一书的开篇即提出,“肇始于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应当被看作是“预示着并指向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sup>[8]</sup>也即“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如此,胡适还进一步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着非常明确的使命。他这样写道:

它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运动。其领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知道为获得自己所需,他们必须破坏什么。他们需要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以及新的学术。……依我的理解,这些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使命。<sup>[8]182-183</sup>

在胡适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性的一面,正与其“建设”新语言、新文学等这一面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从而正好构成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同时并存的两个侧面。事实上,胡适始终坚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即看作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一看法直至他生命的晚年都没有改变,余英时先生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

四运动的反思》一文中曾指出过。<sup>[9]</sup>可以说,在20世纪30-40年代有关“中国文艺复兴”讨论热潮中,胡适的上述看法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说法之一。

然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学者对于胡适的上述看法从正面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首当其冲的、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李长之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4)一书。在此书中,李长之收录了一篇题为《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的文章,他不仅在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一场“启蒙”运动、而并非“中国文艺复兴”,还明确声称:“外国学者每把胡适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我却不能不说有点张冠李戴了”。<sup>[10]</sup>李长之进而将“五四”的精神概括为:“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而势力。”<sup>[10]23</sup>在此基础上,他还十分犀利地指出了“五四”的缺点:

“五四”精神的缺点就是没有发挥深厚的情感,少光,少热,少深度和远景,浅!在精神上太贫瘠,还没有做到民族的自觉和自信。对于西洋文化还吸收得不够彻底,对于中国文化还把握得不够核心。<sup>[10]25-26</sup>

十分显然,在李长之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一场“启蒙运动”,还远远不能够被称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由此,李长之便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心目中对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热情与期待:

从偏枯的理智变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运动的姿态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应该是新的文化运动的姿态。这不是启蒙运动了。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sup>[10]26</sup>

不难看出,李长之认为,必须彻底转变“五四”时期的文化立场,才能迎来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因此,他的语词里充满了“变”的字眼:“从偏枯的理智变为……,从清浅鄙近变而为……,从移植的变而为……,从截取的变而为……,从单单是自然科学运动的姿态变而为……。”综观李长之上述的诸种主张,李长之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显示出了颇为决绝的告别姿态，难怪有学者甚至指出，李长之此时对于“五四”有着某种明显的“菲薄的意味”。<sup>[11]</sup>

其实，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首先取决于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这也一直都是学界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一旦确定了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认识，那么它与“中国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自然也会变得明朗起来。在民国时期有关这一话题的诸多讨论当中，上述所提到的胡适、蔡元培、李长之等人的观点都非常具有代表性，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彼此的看法却有些对立。在胡适、蔡元培等人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便可以看作是“中国文艺复兴”；然而在李长之的眼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启蒙运动”，而并非“中国文艺复兴”。因此，双方的看法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呈现出某种相互对峙的姿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顾毓琇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观点便显示出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他打破了这种双方对峙的僵局，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值得注意的是，顾毓琇的看法既显示出对于上述双方某些主张的接受，也表现出了对于双方某些看法的调整与扬弃。

### 三

具体来讲，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及其与“中国文艺复兴”复杂关系的问题上，顾毓琇大致接受了李长之的基本看法，但作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正，而在对于胡适的相关看法表现出有所悖离的同时，也体现出了某种继承。

虽然对于李长之将“五四”称为“启蒙运动”的观点，顾毓琇并没有直接地表达出自己是否赞同，但是十分显然，他基本上同意并接受了李长之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区分开来的观点，这无疑意味着对于胡适直接将“五四”看作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看法的某种悖离。顾毓琇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与“文艺复兴”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并指出“文学革命”的重点在于“革命的工作”“破坏重于建设”，这显然有别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顾毓

琇的这一论述，清晰地表明了他更倾向于将“文学革命”与“文艺复兴”看作是前后相互承继的两个阶段，而不同于胡适直接将“破坏”与“建设”看作是“中国文艺复兴”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的观点。

然而，李长之把“五四”看作是“启蒙运动”而更多地加以了批判，顾毓琇却充分地肯定了“五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由此表现出对于胡适看法的某种继承，从而也意味着是对于李长之主张的重要修正。顾毓琇是这样描述“文学革命”的：“文学革命是文艺复兴的前驱”“没有文学革命，便不易有文艺复兴”“破坏以后便于建设”等，借此明确表明“文学革命”之于“文艺复兴”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其中无疑流露出对于“文学革命”极大的认同感与亲近感。因此，在顾毓琇这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如同李长之所强调的那样一种决裂的关系，而是恰恰相反，“文艺复兴”正是“文学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当年“文学革命”最终所要前进的方向。也就是说，与李长之倾向揭示二者断裂转向不同，顾毓琇却更侧重于发掘二者之间前后承继的紧密联系。在这一方面，顾毓琇显然与李长之的看法有所不同，而与胡适的观点表现出更多的接近。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在某种程度上，顾毓琇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之间关系的理解，可能相对更加冷静与客观。有必要补充的是，李长之后来在文章《五四——蔡子民——大学教育》中，把先前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的批判态度予以了重要的调整，转而承认“五四”与“中国文艺复兴”之间有着前后承继的重要联系，甚至明确声称：“这种启蒙式的五四未尝不孕育着一种文艺复兴”“五四虽不是文艺复兴，但却含了萌芽”。<sup>[12]</sup>不难看出，李长之此时对于“五四”及“中国文艺复兴”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正与顾毓琇的看法似乎有着某种不谋而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学者那里，顾毓琇的这一看法也同样得到了某种共鸣和回响。陈太胜教授在《从李长之到梁宗岱——兼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期》一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期革命”，

三十年代兴起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期革命”。<sup>[13]</sup>尽管所使用的具体名称有所差异,但他们同样都不约而同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看作是同一运动前后承继发展的两个阶段,既指出了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同时也强调了他们内在的紧密关联。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进一步证明了顾毓琇上述看法的重要价值。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文艺复兴”讨论热潮的蓬勃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关系也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重新审视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胡适、蔡元培、李长之、顾毓琇等人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相关思考,可能会带给我们重要的灵感与启发。尤其是重新审视一直被埋没的顾毓琇的观点,也许会获得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崭新视角。

#### 参考文献

- [1] 张秀杰. 文理兼通的一代宗师[J]. 上海戏剧, 1996(6): 30.  
[2] 《顾毓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毓琇全集·前言[M]//顾毓琇

- 全集(第1卷).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3.  
[3] 顾毓琇. 中国的文艺复兴[M]//《顾毓琇全集》(第8卷).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123.  
[4] 罗志田. 中国文艺复兴之梦: 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裂变中的传承: 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4-91.  
[5] 胡适. 胡适全集(第30卷)[M]. 季羨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5-6.  
[6] 于阿丽.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称呼的由来及相关问题[J]. 关东学刊, 2016(5): 52-63.  
[7] 郭辉, 吴敏. “中国的文艺复兴”: 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独特定位[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10(4): 48-53.  
[8] 胡适. 中国的文艺复兴[M]//欧阳哲生, 刘红中. 中国的文艺复兴.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181.  
[9] 余英时. 文艺复兴乎? 启蒙运动乎? ——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M]//重寻胡适历程: 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50-251.  
[10] 李长之.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M]//李长之文集(第1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19.  
[11] 张蕴艳. 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25.  
[12] 李长之. 五四——蔡子民——大学教育[M]//李长之文集(第3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346-348.  
[13] 陈太胜. 从李长之到梁宗岱——兼论中国新文化运动第二期[J]. 文艺争鸣, 2004(1): 48-52.

## “Literary Revolution”: the Precursor of “Renaissance” Centered on GuYu-xiu’s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1948)

YU A-l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Abstract:** As a world famous Chinese scientist, Gu Yu-xiu was the author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1948). He explicitly stated in this book that although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a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appeared to be in conflict with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movement on the surface, it could be better understood as the precursor of the “Renaissance” because the two succeeded with each other and borne close connection. The view differs from that of Hu Shih and Cai Yuan-pei who directly equale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o “Chinese Renaissance”. His view is also different from Li Changzhi who argued that fracture and turning points exist between the two.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oday’s academic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Keywords:** Gu Yuxiu;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terary revolution; Renaissanc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责任编辑 夏登武)